

紫禁城，作为清代皇帝日常起居和政务活动的重要场所，有着森严的门禁制度。

自乾隆朝以后，门禁制度日渐废弛，乱入宫门的情况时有发生且日益严重，

最根本的原因是值守人员的松懈渎职以及清代旧制之遗患。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皇帝频频谕令加以整顿，内务府亦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门禁的管理。

不过由于多为治标之策，其效果十分有限。

特稿

清代紫禁城门禁的废弛

郭威

曾任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原陈列科，先后参与故宫博物院「天府永藏」、「万寿庆典」、「寿康宫原状展」等多项展览等工作，发表有《清宫御制文物述略》等文

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既是

皇帝及皇室人员活动的重要场所，又是

众多衙署的所在地。因此，如何拱卫皇

室、保护紫禁城的安全，成为明清统治

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明、清朝均

借鉴古制，结合自身特点，制定了严格

的门禁制度。

代紫禁城有着一套完整的门禁制度，用

以拱卫皇室。

清代统治者认为，明代「紫禁城内，

非特官员等不得轻至」的门禁政策导致

「内外阻隔，下情不能上达，纲纪堕坏」，

并认为这是明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

他们吸取了这一深刻教训，并着力进行

了改进，强调「我朝革除一切秕政，首

在通下情而宣上意，每日宵衣视事，召

对臣僚，周咨庶政，乃至外来道府等官，

亦俱准其亲诣宫门，递折请训，无不随

时召对，法良意美，从无堂廉隔绝之事」。

（庆桂等编纂《国朝官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页六〇）政务的沟通虽然得到

加强，但是却为紫禁城的门禁管理增加

了难度。除上述臣僚、官员可随时召对

外，清朝每年尚有大量杂役人员出入紫

禁城。因此，清代外来人员出入紫禁城

相较明代更为频繁，且人数众多，这对

于清代帝王及管理清官门禁的内务府来

说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面对挑战，统治者主要从人员、制

度两方面强化门禁制度。

精锐的守卫人员

「自古天子端居法门，必有期门羽

林之士环卫而拥护，是故周庐千列，执

清代紫禁城门禁制度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国朝

宫室」云：「从来立国者必首隆庙社之

规，崇建阙廷之制。所以象辰极，抚寰

区，昭诚敬而敷化理，典綦钜也。」清



乾清门广场处原侍卫值房处现貌

阅读链接：郎卫与兵卫

郎卫又称亲军营，主要负责保卫宫廷和作为皇帝的随从武装，是皇帝身边的亲军。郎卫俱由领侍卫府统辖，全部官兵都是从正黄、正白、镶黄等所谓上三旗的人员中挑选的，由这三个旗各派二人为领侍卫大臣以率领之。

兵卫主要负责卫戍京师的工作。在兵卫中又分护军、骁骑、前锋、步军各营。又在各营内（包括亲军各营）挑选更精锐者编为神机营、健锐营、火器营、虎枪营等“特种兵”。

戟百重，入守禁廷，出司警蹕，职綦重矣。」清代紫禁城的守卫力量主要由上三旗护军官兵、前锋营官兵，内务府三旗包衣骁骑营、护军营及侍卫处组成。其中，上三旗护军官兵、前锋营官兵是紫禁城内部主要的守护力量，负责守卫的处所较多，紫禁城四门——东华门、西华门、午门、神武门即由其负责。内务府三旗包衣骁骑营、护军营主要负责内务府诸多机构及太后、太妃所居各处的守卫，每日轮班值守。侍卫处的侍卫值守有内、外班之分，外班负责太和门的守卫，内班负责乾清门、内右门、宁寿门，并分担神武门的守卫。他们分区负责，互不统属，都只对皇帝负责，人员上选取八旗军中最可靠的满洲八旗上三旗的精锐，同时，采取郎卫与兵卫并重等防护措施。



如果说紫禁城的守卫官兵是皇宫的安全屏障，其武器装备则是实现这一保障的物质基础。紫禁城守卫禁门的官兵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顺治年间规定：紫禁城四门护军校、护军值宿之处配备弓、箭、撒袋、长枪等；护军每人备有甲、盔、撒袋、腰刀各一份，箭七十支；每二人合用长枪一杆。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护军配备了鸟枪。精兵强将再辅以利器，气概威严，增加了拱卫皇室的力量。

严格的门禁制度

紫禁城的门户安全还有赖于严格的出入门禁制度。

顺治初年，内务府即有各色人等出入各门之规定。其中，内阁及各部院官员，八旗都统、参领等及各衙门书吏皆由午门左门出入，午门右门只许王公行走。其余内大臣、侍卫、内务府官员及各执事人、内监、厨役、工匠、服役人等皆由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及应行走之门出入。此外，内务府还要求内府人员提供身份证明，若系公职人员，需



清人绘 乾隆大阅图卷（局部）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描绘的是在乾隆皇帝检阅八旗军兵时严阵以待的左翼骁骑、护军队

将姓名、所隶旗分、佐领、内管领等信息登报造册，咨送主管部分备案。若系工匠、服役人等，则由主管衙门给以烙印印腰牌，书写姓名，出入皆应佩戴。紫禁城各门皆有识字的护军专司检阅备案信息，稽其出入。若无备案之人及不带腰牌者，不准放入。为增加威慑力，内务府在「各门设红杖各二，以护军二人更番轮执，坐于门口，亲王以下经行，皆不起立，有不报名、妄自擅入者挞之」。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五四）

顺治九年，内务府对门禁制度又有了修订：除服务于内廷之内大臣、护军统领、护军参领侍卫外，其余王公大臣等人皆由午门出入，不许由其他三门出入。此外，内务府还规定了王公等人入禁城时的随从人数：亲王可随带六人，世子、郡王可带五人，长子（郡王嫡子）、贝勒可带四人，贝子三人，公二人，民公（非宗室封公爵者）、侯、伯、都统、尚书、护军统领、副都统、侍郎可随带一人，其余官员不许带随从。尤应注意的是，内务府特别强调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对入宫之人要「逐一询明放入」，若有混入者，拿交刑部治罪，「若不逐一



清 庆宽等合绘 载湉大婚典礼全图册（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可见紫禁城东华门的守卫官兵



清 庆宽等合绘 载湉大婚典礼全图册（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可见紫禁城神武门护军

延伸阅读：昙花一现的「高端」门禁——门照

清末，随着时代的变迁，腰牌已不足以担当紫禁城门禁之重任。门照成为继腰牌之后出现的又一重要的出入禁宫之凭证。

门照产生的时间大概应在光绪后期。从现存印版看，其形状与腰牌基本相同，但内容与质地存在差异。腰牌为木质，门照既然有印版，当为纸质。腰牌书写内容较为简单，门照上的书写内容涉及颁发的具体原因、年代，至于使用者的年貌等内容是否书写，印版上并无反映。宣统时期内务府规定门照、腰牌须粘本人相片，其实应只有门照贴相片，腰牌乃木质，且制作粗糙，无法粘贴照片。

门照的使用者与腰牌不同，主要是各衙门当差的司员等，包括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以及理藩院等各衙门人员，其数目并不固定。门照在使用初期由各使用机构自行发放，然后将发放清册呈交内务府以备核查。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门照和腰牌统一由内务府重新筹备。逊清时期，紫禁城内廷区域仍为皇室居住区，旧有的门禁制度一如既往，门照、

腰牌仍是出入其中的重要凭证，亦执行了定期更换的制度。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出入紫禁城的人员急剧增多，还迎来了一次发放门照的小高潮。但复辟仅十二天即告破产，紫禁城门照的兴盛局面犹如昙花一现。



清 紫禁城门照及腰牌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门照上的主体文字从右至左为“总管内务府发给出入景山南门门照，以凭稽查放行，此照昇平署副催长长立，敬字第三十八号，癸亥年八月日”，上钤“内务府堂戳记”。癸亥年为一九二三年，是溥仪大婚的第二年。此门照上无持有者的照片。



清 光绪二十八年门照印版
长三厘米 宽一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件光绪二十八年门照印版上的内容依功能不同，可分三个区域：顶部方框为标题，刻有「门照」二字；左侧部分为文件编号「字第」；右侧为主体，刻「总管内务府为发给门照事。准景运门文称：该处具奏严申门禁章程，备办门照，以凭稽核一折，奉旨依议，钦此。等因前来，本府遵照奏定章程，发给当差官员人役等出入禁门门照，以凭稽查。此照右发给」，「给」字后有留白，以供填写发给人员的姓名等内容。



清 光绪三十一年门照印版
故宫博物院藏

光绪三十一年印版的形制与光绪二十八年印版基本相同，区别在于主体内容略有差异，但都是讲述发给门照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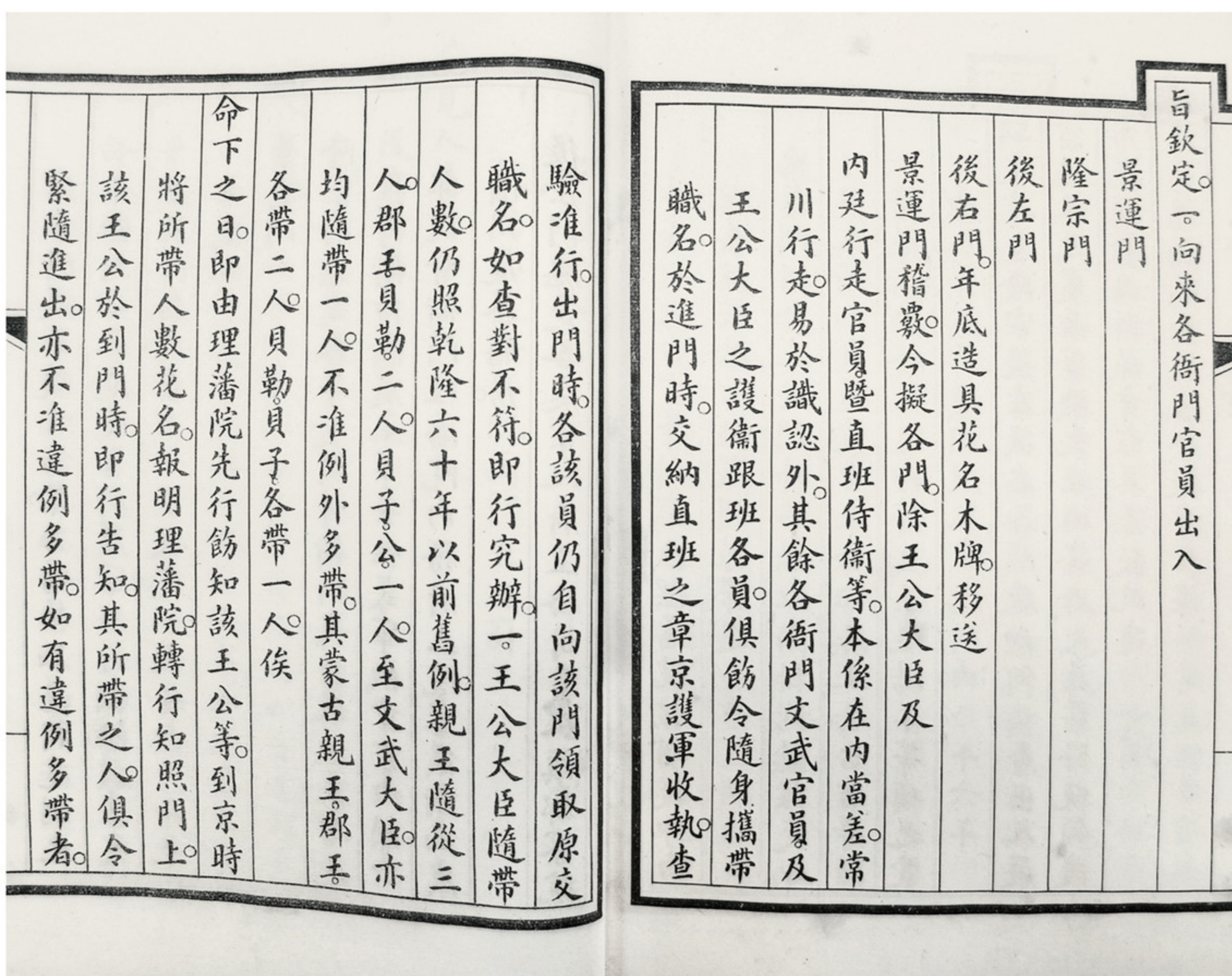
详问，致有妄入者，该统领查出，将守门参领、护军校一并参奏治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五四）此后历朝虽有更易，但都以此为蓝本，其根本未变。

门禁制度的废弛

乾隆朝之前，紫禁城的门禁制度应是得到了有效贯彻的。对此，史书档案虽无确切记载，但自顺治年间内务府初定门禁制度起，历经康、雍两朝，该制度仅有微小调整，其稳定性充分说明了其行之有效性。但进入乾隆朝，门禁制度就遭遇严重挑战。

门禁制度遭遇挑战

进入乾隆朝，紫禁城的门禁制度有了较大的变化，这是原有门禁制度亟待完善的客观需求。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民人陈如鉴携带人参私自出入禁门。乾隆二十三年，有疯癫僧人持刀闯入东华门。此后，这种闯入、混入紫禁城的事情时有发生。官禁直接影响帝后的人身安全，这引起了乾隆皇帝和内务府的高度重视，为此，清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有关官员出入禁城随从数目的规定

廷连连降旨严加整顿，内务府亦多次调整门禁制度。即便如此，紫禁城的门禁管理并未有所改观。仅乾隆一朝，乱入禁城的案件就达十二起之多。

至嘉庆时期，紫禁城的门禁制度遭遇更大挑战：嘉庆八年（一八〇三年），

陈德于神武门内行刺嘉庆皇帝；嘉庆十五年，膳房太监于进忠私自收留侄子在

大内住宿两月有余；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林清等人更是攻入紫禁城，「守午门

之策凌闻变，竟率兵开门首遁」。《啸

亭杂录》卷六）如此种种，都亟需皇帝和



午门门内现貌

内务府拿出更为切实可行的门禁措施，以改变日益废弛的门禁状况，嘉庆十六年、十八年，嘉庆皇帝连发多道谕旨以强化门禁管理，但接踵而至的天理教混入禁城事件则宣告了其努力的失败。道光朝以后，紫禁城门禁废弛的状况仍未有所好转。道光、咸丰诸帝不断寻求解决之道，但均成效甚微。

门禁制度废弛的原因

面对紫禁城门禁废弛问题，皇帝及内务府也在不断追究原因，亦有自己的见解。但由于其自身局限，他们认识到清代至乾嘉时期已积累了各种深层矛盾，整个官僚体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加剧，而门禁废弛作为其矛盾的缩影必然有所投射。人们不禁要问：善战的守卫、精良的装备、严格的制度，在让紫禁城内的统治者享受了一百多年的安宁静谧后，为何屡出状况？

归纳其因，主要有三：

其一，太监管理日渐松散。清宫之中，太监人数众多，乾隆皇帝曾将其额定为三千三百人，虽然此后从未足额，但亦基本维持在两千人以上。更为重要



清 金廷标 弘历行乐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手捧漆盒的两人应为内侍太监

的是，清宫太监的诸多生活之需须自备，使其得以频繁出入禁城。由于太监身属内廷，值班守卫人员查验并不认真，尤其是宫中需用杂役人员亦常由太监带领入宫，以致常有太监引亲属混入宫中。

经过商议，内务府制定出应对方案，决定加强宫中太监他坦（指太监在各处的值班室，休息处）的管理。据统计，嘉庆时紫禁城内共有他坦四十余处，除内殿

他坦、宁寿宫他坦外，其余他坦交由总管太监等九人分管，每人负责五处。但较为可笑的是，其分管地方取得的方式竟是拈阄。如此重要任务竟然采取如此随意的分配方式，且内务府还堂而皇之地将之上奏，嘉庆皇帝竟然允从，实在令人惊讶！内务府处理如此草率，其效果必然令人忧虑。

其二，出入凭证存在缺陷。自清初

始，出入紫禁城的各色人等即有不同的凭证，其中以腰牌的使用最多。乾隆朝以前，腰牌的制式并不统一。有的书写使用者所属衙门的名称，有的书写制造颁发腰牌的衙门的名称，各种名目皆有，且形制大小不一，这为稽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也埋藏着巨大的隐患。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内务府决定统一腰牌式样，将以前各种腰牌全行销毁，规定以后「**总以新造腰牌为凭**」，并将新造腰牌式样咨送景运门护军统领及各门以凭查对。这次改革较之以前最大的创新在于：一、增添了内务府火印作为区别真伪腰牌的重要依据；二、基本确立了腰牌的制式，此后不再有变动，只是一些临时性的纸质腰牌的式样略有变化。

但这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直至道光时期，内务府颁发的火印腰牌的內容都比较简单。腰牌上虽有内务府火印，但并未标明差役在何处供职，致使宫内各处人役「漫无区别」，不便稽查，且有冒用之虞。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内务府奏请按照原设腰牌式样重新制造，上面增添了各部院、衙门的名目，并规

定用火印戳记后方可颁发使用。这使得清宫腰牌更加规范化。

咸丰时期，内务府要求各衙门及内务府所属各处将进内承应各项差役人的年龄、相貌、在何处任职、任何一种差役都详细开写，造具清册，并将年貌细册汇总，分为两份，一份咨送内务府，一份咨送景运门护军统领及各门，以便核查底档及出入禁门时查对。并议准在腰

牌正面书咸丰年号，后面填写年貌等（但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年号、年貌均写于腰牌正面的情况较多，所幸所要求写的各项内容均比较翔实，并无遗漏）。又规定：如遇「差役内有革退等项事故，接充（替）之人年貌不符，由该衙门将接充之人花名、年貌于腰牌内随时更换，若报内务府暨景运门稽察」。（《钦定内务府现行则例》）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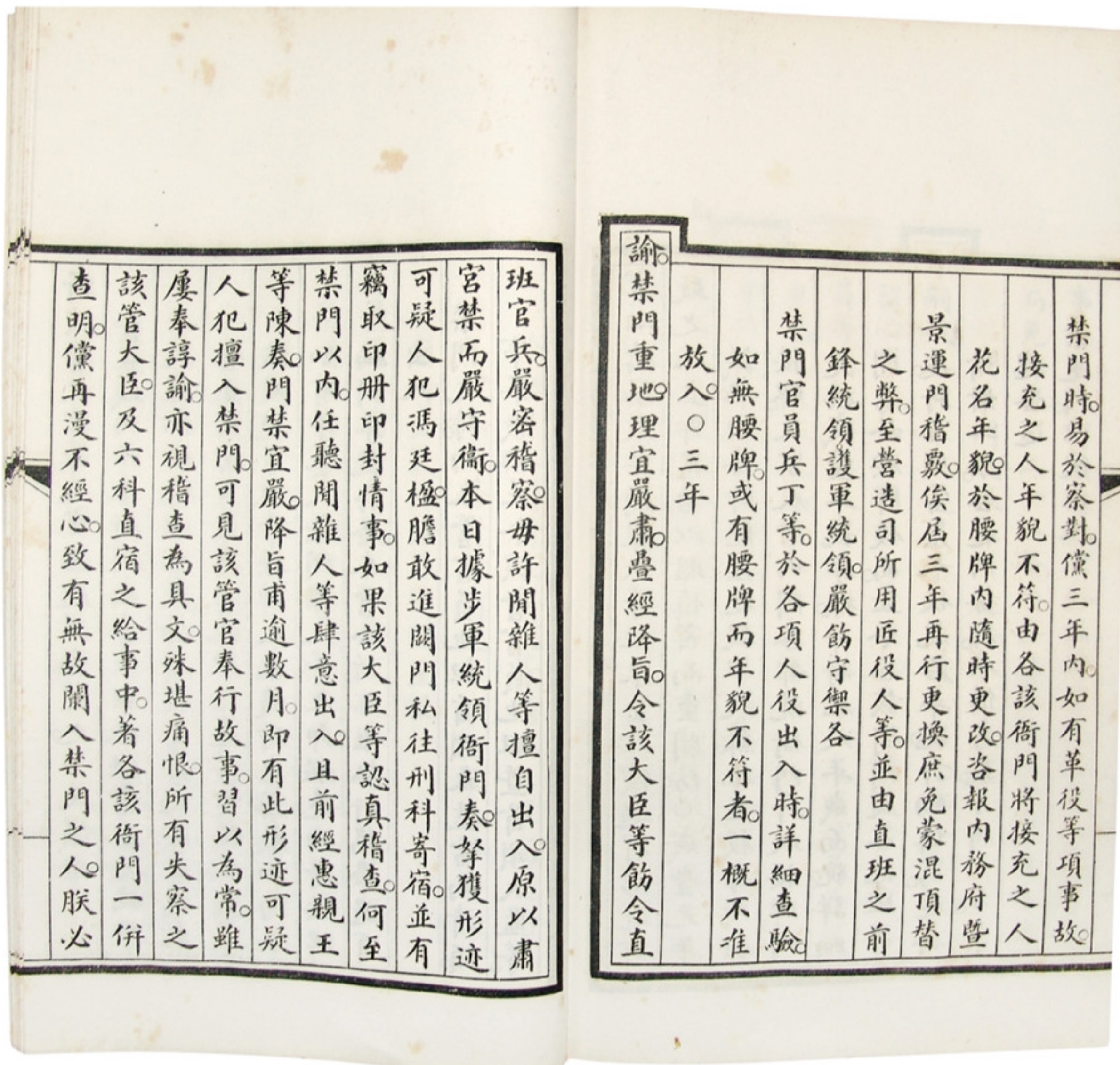
清宫腰牌的制式、内容才基本完善。

其三，值守官兵松懈渎职。这点最为关键，其表现有三：

首先，武备不修。乾隆时期，紫禁城内各门摆设有梅针箭九千九百六十支，弓四百四十三张，撒袋四百四十三副。根据清代定例，这些兵械要每二十年修理一次。但自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修理后，至乾隆三十九年，仅仅时隔五年，梅针箭仅余三千四百余支，弓四百四十



宫中旧藏惩罚太监档案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禁宫之内的腰牌使用规定



清 铁镞厄鲁特梅针箭
长九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木黑牛角金桃皮弓
长一七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黄色绒囊鞬
囊长三〇厘米 宽二四厘米
鞬长七〇厘米 宽三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绘 光绪便服写字像轴
故宫博物院藏

张，撒袋四百三十副，「其余俱系私补者」。紫禁城外各门器械共有梅针箭六千八百六十支，弓三百四十三张，撒袋三百四十三副。根据清代定例，每十五年要修理一次。查自上次修补后，至乾隆三十四年应重加修理，但直至乾隆三十九年——已逾期五年仍未作修整，「以致敝坏尤甚」。（《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一）

嘉庆时期，这种情况并未有所好转。嘉庆皇帝对此曾表示不满：「国家修明武备，禁暴戢奸，必平日纪律严明，器械坚利，方足称干城之用。近因承平日久，渐就废弛。卒伍既多怯懦，军器敝坏相仍，一有缓急，备御全不足恃。即如前月十五日，贼匪突入禁门者，仅止数十人，各处守门官兵，不能立时擒捕，甚至各门所备弓箭刀矛，全系饰观，不堪应用，尤为可詫！」（《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六）

其次，值守脱岗。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正月十五日，午门正白旗护军校进班画押后，即行离开，直至闭门，仍未到值。同年五月，宁寿宫周围值班官兵多人出外采办食物，擅离职守。对于这种情况，本当严厉处置，不过执法

人员认为「姑念时事维艰，兵丁寒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禁城现行则例》），所以从宽处理。

再次，兵丁清贫。清末，负责守卫皇宫的前锋、护军营官兵非常困苦，费用不敷值班，时有侵吞缺额问题出现。不过考虑到前锋、护军数额不多，「天子禁兵非他营可比，独优不嫌偏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禁城现行则例》）所以，虽然库款支绌不能全营遍加，却也可以酌量增加，让值班官兵「足敷值班用度」，且不许丝毫减扣、侵吞。对此，光绪皇帝给予支持，并给值班官兵发放实银。即便如此，官兵监守自盗、装饬妄拏的事件亦时有发生。不仅如此，禁城内竟私开烟馆、赌局多处以「创收」，商贾等人竟可随意出入。

针对守卫官兵懈怠渎职、腐化贪饷等问题，乾、嘉以后皇帝颁布多道谕旨，重申政令，颁发补救措施，以期有所整顿。但是守门官兵每遇饬禁，不过十日半月严加查管，事隔数日仍复懈怠。诸多措施的不断补充，使得紫禁城门禁制度虽日趋繁密，但收效却微乎其微。



清 银虎钮“正黄旗护军统领印”

通高九·一厘米 印面长一〇·六五厘米 宽一〇·六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对门禁措施强化的评析

门禁制度的不断升级并未改变门禁

废弛的现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据

《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曹泳祥等带器械闯入禁门；光緒十九年，民人郑连元闯入西华门；光緒二十年，已革都司宋文刚混入神武门，闯至乾清门。

面对此种局面，内务府已是束手无策，其强化门禁的措施都是针对具体案例而发，有很大的局限性，治标不治本。那么，内务府未能拿出治本之策的原因是什么？

光緒朝内阁学士宝廷认为，紫禁城内前有前锋、护军统领十人，内务府也有护军统领，这就造成了位均权分，无所统属，互相推诿，以致整顿无从着手。他还认为，负责守卫禁城的武官品级太低（二品），而出入禁门的不是王公就是太监，「多所瞻顾，诿敢严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派位高权重之大臣来总司门禁诸事。不过议事大臣认为，这「非臣下所敢拟请」，应由皇帝决定。对于事权不一，议事大臣认为内务府护军营值班官兵也归景运门值班的前锋或

护军统领管辖，且内务府护军统领只是三品职衔，所以并不存在位均权分、无所统属的情况。

姑且不论「事权不一」、「诿敢严查」的论断正确与否，不可忽略的还是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八旗军队的衰落。随着承平日久，统治阶级逐渐堕落，八旗军队日趋腐化。嘉庆以后，八旗军逐渐演变成专靠国家供养的「社会救济组织」，失去了起码的战斗能力。《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为镇压白莲教，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健锐营和火器营被派往前线，结果他们「俱技艺平常，不耐劳苦」。对此，嘉庆皇帝非常气愤，「今满洲兵丁，不但远逊当年，且不及绿营」，他「实为愧之」。

负责皇宫守卫的官兵主要来自皇帝亲领的上三旗。随着尚武精神的失落，宫廷守卫好逸恶劳的现象蔓延，军事素质全面下降，官兵的骑射技能越来越差，甚至上操、应差也都雇人顶替。在皇帝出席的玉泉山阅兵大典上，他们也毫不收敛，由仆人携带兵器，骑马、乘车赶赴演武场。嘉庆二十年，嘉庆皇帝阅看



清乾隆 银虎纽“三旗领侍卫内大臣印”

通高九·一厘米 印面长一〇·七厘米 宽一〇·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左右两翼前锋营官兵射靶，两百人内竟无一人能够五箭全中。

不仅如此，身为皇帝近侍的侍卫亦皆平庸无能之辈。《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时「宗室章京侍卫等不以骑射为事，亦不学习清语」。陈德行刺嘉庆皇帝时，只有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等六人挺身而出，其余侍卫皆惊慌失措。侍卫的堕落是整个清宫守卫废弛的一个缩影。

其二，包衣制度的滥觞。包衣制度对紫禁城门禁制度影响至深，内务府即是满族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包衣牛录与封建皇权政治结合的产物，其所属成员来自内务府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包衣三旗）。内务府三旗除组建护军营守卫紫禁城外，还是清宫诸多事务杂役的主要来源。由于宫中所需杂役颇多，为加强管理，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内务府规定各处将所用苏拉（清宫低级杂役）数目要按月汇报。乾隆四十三年，经福隆安等人奏请，内务府规定宫中每年所用苏拉以五万为准，「不得擅行多用」。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年），内务府共用苏拉三万七千七百余名。嘉庆八年，内务府共用过苏拉四万八千六百余



清 八旗甲胄
故宫博物院藏

阅读链接：清代擅入禁城情况简表

时间	人员姓名	身份	宫门	进入途径
乾隆十一年	陈如鉴	民人	东华门	拿他人腰牌进入
乾隆二十三年		疯癫僧人	东华门	持刀闯入
乾隆二十五年	李三等	民人		顶替侍卫茶房人役
乾隆三十年	永保等四人	苏拉等		顶替他人差使
乾隆三十五年	林进福	已出宫为民的太监		
乾隆三十七年	明柱	已被革退的披甲人	东华门	太监带入
乾隆四十一年	李二	民人	神武门	谎称跟随
乾隆四十一年	大小儿	亲军家人	西华门	谎称跟随
乾隆四十三年	高禄、高五十儿	民人	神武门	谎称跟随
乾隆四十六年	高二	民人		
乾隆四十八年	姜六	民人		太监私自招募
乾隆四十九年	李永泰	民人	西华门	谎称随从
	呼什图	和坤家太监		
嘉庆五年	永玉			永玉之父带入
嘉庆九年		僧人	神武门	混入
嘉庆十五年	德林	太监于进忠的侄子		于进忠带入
嘉庆十五年	杨三	民人		太监私自招募
嘉庆十九年	张奇禄	民人	神武门	谎称腰牌在内
嘉庆二十四年	成德徵	民人	神武门	混入
道光三年	四儿	苏拉常禄的堂兄		苏拉带入
道光十九年	马二格等	民人	西华门	混入
道光二十二年	常海	披甲人	神武门	
咸丰元年	白大	太监家属	西华门	借用太监腰牌进入
咸丰四年	富升	马甲 (八旗骁骑营士兵)		混入
同治二年	王永祥	旗人	神武门	利用拾取的腰牌进入
同治二年	常升	旗人	东华门	
同治二年	王保恒	管领下人	神武门	
同治四年	张得全	旗人	东华门	
同治四年	苑长海	逃走的太监	东华门	
同治四年	李虎	民人	西华门	
同治八年	徐徐氏	苏拉之妻	神武门	太监带入
同治九年		售卖食物之人		
光绪四年	周臭儿等	民人		太监带入
光绪五年	李钟铭	山西民人	景运门	
光绪六年	刘振生	疯子		混入
光绪七年	王五等人			太监招引入内
光绪八年	董三等	民人		
光绪十一年	曹泳祥等			闯入
光绪十九年	郑连元	民人	西华门	闯入
光绪二十年	宋文刚	已革都司	神武门	混入

（资料主要来自《清实录》《内务府奏案》《内务府奏销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及《禁城现行则例》等）

人。若按月计算，则嘉庆三年宫中每月需用苏拉三千六百余人，嘉庆八年则升至四千余人。如此众多的苏拉出入禁城，必将给值班官兵的稽查带来困难。而苏拉人等亦日久生怠，对禁门制度亦不再畏惧。档案记载，嘉庆十九年，苏拉头目王四患病不能当差，雇觅民人张奇禄代其入内当差。后因王四未能支付其全额工钱，张奇禄私自入宫讨要，方于夜间被查更人员拿获。宫中各处也自行雇觅人役，都极大地破坏了紫禁城的门禁制度。

其三，官员随从众多。官员入宫都带有一定的随从，内务府曾规定其数量，但实际执行却相当困难。因清代官员经常出入宫廷，其随从人员总量较多，而这些随从频繁出入禁门时，过繁的检查不仅耗费精力，且易为王公所不喜。所以，一些值班官兵的检查并不认真，以致常有人冒充随从从人员混入宫中。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民人李二即假充跟随混入神武门。

八旗军队是清王朝的根基，不容动

摇。而包衣制度则是旧有习俗，是内务府为皇帝服务的重要依靠力量，为内务府三旗诸多人役提供了工作机会，亦不能更改。至于官员随从问题，则直接关系到诸多上层官员的利益，根本不在考虑更改的范畴之内。此三者无可更张，治标之策无从制定。

最终，统治者只能对既有的门禁制度进行不断修补，进行细枝末节的改进，其结果必然不尽如人意。

